

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初探

萧致治 任泽全

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。历史上每经过一次革命,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场阶级变动。在辛亥革命中,有些封建老朽顽固不化,也有一些人经过革命的冲击,终于看清了时代的趋势,逐步转变了态度,变成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。曾经在民国时代两任大总统的黎元洪,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。探讨一下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阶级转变,对于明确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,将是有益处的。

黎元洪(1864—1928),字宋卿,湖北黄陂人。早年随父迁居直隶北塘,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,1888年毕业,派往北洋水师见习。黎在海军中服役七年,甲午战后南下投靠署两江总督张之洞,不久随张回到湖北,从此青云直上,由马队帮带升到混成协统领。

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,革命党人一夜之间攻下总督署,占领武昌城。当时革命的重要领袖都不在场,黎虽向与革命无缘,但在群众中有点声望。革命党人推举他为湖北军政府都督。开初,他担心革命不能成功,不肯就任。后来,汉阳汉口相继光复,京山汉川先后起义,革命军又挫败了南下清军。黎见胜利有望,才开始转变态度,愿意就任都督。

武昌起义以后,清政府集中全力向武汉反扑。黎元洪和革命党人一起组织力量,迎击清军,坚持奋战40多天,为各省独立提供了条件,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发展。

袁世凯出山后,一面大举进攻,一面派刘承恩等抵武昌诱降。黎元洪在各省相继独立、全国人民心向共和的鼓舞下,拒绝了袁世凯的“君主立宪”条件,指出假托君主立宪保存清朝统治,乃“赵高、张邦昌之所为”,反劝袁世凯“翻然速来”,“共扶大义”。^①后来在南北和谈中,黎一面主张和谈,同时屡次致电各省,严防袁“利用停战,先下秦晋,再图南犯”,指出“能始能守,能守始能和。我军计划,但当从战字着想,和则视为意外结果。”停战议和期间,必须积极筹画,“一旦决裂”,“立即开战”。^②这种指导思想表明:黎已作了一旦和谈破裂,即与清军决战的准备。

随着南北和谈达成协议,清帝溥仪退位,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,民主共和取代了君主专制,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袁世凯为了推行独裁统治,一方面对革命党人采取分化瓦解政策,企图逐步消灭革命势力;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支持者,扩充自己实力。黎元洪“有首义元勋与副总统之资格,乃袁求之不得之工具”。^③收买拉拢,不遗余力。黎元洪对袁的阴谋认识不清,同时迷信袁的武力,企图借袁自重,在袁世凯统治初期,和袁狼狈为奸,充当了袁剿灭革命势力、推行独裁统治的可耻帮凶。

1913年二次革命后,革命势力损失殆尽。袁世凯踌躇满志,恨不得把异己势力全行消灭。黎元洪虽然曲意奉承袁世凯,袁却以黎有首义元勋之名,又踞于湖北中心之地,仍不放心,乃于是年12月初派段祺瑞南下武昌,迫黎北上。黎元洪被迫匆匆就道,一入都门,就被请进

曾经囚禁光绪帝的瀛台，成为光绪帝第二。

黎元洪在瀛台幽居两年，名义上是副总统，参谋总长，参政院长，实际上无一点实权。后来，袁世凯帝制自为，想利用他作工具，他消极抵制，拒受王封。

1916年6月，袁世凯在全国痛骂声中死去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宣布遵行南京临时约法，续行召开国会。黎任总统期间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，黎不甘作傀儡，演成府院之间的长期斗争。最后，黎无可如何，下令免除段祺瑞职务。段煽动各省督军脱离中央，造成“九省督军皆反”。他无法收拾，只得接受别人建议，电请张勋入京调解。张勋乘机带兵北上，于1917年7月1日拥废帝溥仪复辟。黎知上当，又通电反对复辟，号召全国讨伐张勋。

张勋复辟失败后，黎元洪长期寓居天津租界，除书法自娱外，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活动。1922年，直系军阀头子曹錕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权，企图利用黎实现“南北统一”，以便控制全国，又把他拉出来复任大总统。他提出“废督裁兵”作为条件，得到曹吴的许诺。黎上台后，很想实践自己的主张，可是处处受到军阀掣肘。一年以后，又被曹吴等硬逼下台。

黎元洪两次担任大总统，两次受到军阀捉弄，知道在军阀割据下不可能有所作为，从此绝口不谈政治，专意从实业活动。1924年，段祺瑞复任执政，想再利用他作傀儡，遭到他的拒绝。不久，孙中山北上路过天津，携疾张园，黎几次前往视疾；后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，他在私宅设祭遥奠。黎在晚年虽然不问政治，因为深感“兵连祸结，疮痍满目”，仍主“立时罢兵，化除畛域”，实现和平统一。

在以往的历史著作中，辛亥革命后的黎元洪，多被视为反动势力的代表。实际上，从他的思想和言行看，已在逐渐转化，把他说成反动势力的代表是违背历史真象的。

过去人们责骂黎元洪，将他看成反动势力的代表，主要是在袁世凯窃权时期，投入袁的怀抱，大量杀害革命党人，把北洋军引进湖北，充当了袁世凯的帮凶。如果只看这段时期的表现，他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可是，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，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。对于黎的罪过，我们既没有必要隐讳；对于他的转变，我们也应当有勇气承认。历史在不断发展，人也在不断变化。评价历史人物，必须有历史发展的眼光。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既不忽视他的过去，也要看到他的发展变化和结局。对待黎元洪如果不局限于他的过去以及袁世凯窃权初期，而是放眼考察他的一生，对他的发展变化进行全面分析，不难发现，他在辛亥后的转变是不容忽视的。

首先是思想观点有重大转变。辛亥革命前，黎对清朝专制统治不曾有过异议，封建思想无疑居于统治地位。经过辛亥革命，他亲身感到民主共和乃大势所趋，民主共和思想逐渐取代了封建专制思想，完成了由帝制党向共和派的思想转变。

宪法是立国的根本，“法律造端，实为宪法”。黎对制宪比较重视，认为“民国奠定，编订宪法，是其先务”。^④1916年他继任大总统后，鉴于“宪法未定，大本不立”，下令国会恢复，即“专以制宪为要义”。^⑤

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盛行两党制。黎在民国初年，对两党制十分热心，认为是使民国富强之道。他说：“查政党公例，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，英之自由保守，美之民主共和，互相提携，同臻福利。”^⑥当时国民党已经成立，成为国内第一大党；他为拼凑另一大党，派孙武广事联络，终于使共和、统一、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，并被推为理事长。进步党成立，他觉得“适符初志”，十分快意。虽然进步党不过清末君主立宪派的化身，在袁当政期间，又充当过袁的政治工具。然而，比之君主专制，毕竟是一个改变。后来的护国运动，进步党曾起

过一定作用，也是应该肯定的。

特别值得重视的，是黎元洪倡导的军民分治思想。民国初年，北洋军阀以及地方大小军阀推行军事独裁统治，集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，或者雄据中央，或者独霸一方，以民国之名，行专制之实。“权力之雄，罕与伦匹”，“叱咤则山岳为崩，挥霍则江湖俱竭。”黎元洪虽也出身军界，却不赞成军事独裁。早在武昌起义之初，他就提出自己只管军事，民政请另举贤能。后来，他鉴于清末“督抚拥兵，兼干民政，以至好恶任心，法纪扰乱”，不堪收拾，一再提出民国新建，应以前车为鉴，建议效法日本美国，实行军民分权。他痛切指出，军人干政，军民不分，有十大害处，积极主张“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”，并且提议就军民分治问题，请议会“立予表决，一致进行”。^⑦为了贯彻这种主张，他从民国元年7月1日起，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，以为天下倡。

黎元洪的军民分治主张，在军阀独裁统治下，是无法实行的，但就反对军阀独裁而言，不失为一种进步主张。当时黄兴就表示：军务民政，“混而为一，适成两败，……前清蹈此，致速覆亡。民国初兴，……岂可沿讹贻误来轸！务当早日划分，期与各国一致，庶几军民安帖，分道进行。”^⑧

其次，也是最主要的，是政治态度的转变。推翻几千年的君主制度，建立民主共和，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。如何对待帝制与共和，是政治态度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。

中华民国成立，共和体制虽算初步建立，然而很不巩固。帝制复辟的暗流，依然潺潺有声。以满族亲贵为核心的宗社党，一直在招朋引类，伺机东山再起；张勋的辫子军，背上仍旧拖着粗长的发辫，随时准备复辟；声势显赫的袁世凯，发誓忠于共和不过官样文章，骨子里则在处心积虑，指望有朝一日登上皇帝宝座。事实表明，共和国建立了，共和与帝制的斗争并未结束。怎样对待帝制复辟，对黎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考验。

在对待帝制上，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竭诚帮助下转变态度后，一直表现不错。袁世凯帝制自为，为了争取黎的支持，一面赠以高官厚禄，一面结成儿女亲家。黎始终不屈。1915年8月，帝制的策划者杨度前往游说，黎愤愤说：“我身为民国副总统，对此违背民国事，非所愿闻。”^⑨袁想利用参议院作推行帝制的工具，身为参议院院长的黎元洪，借口“病脑”拒不出席，并一再请辞副总统、参政院长，要求回黄陂休养。蔡锷夤夜访黎，探询对帝制态度，他表示极端反对。^⑩11月15日，袁封他为武义亲王，其亲信黎劭平问他如何应付？他说：“反对帝制恨无力，赞成帝制决不可。如果帝制实现，余惟一死而已。”言毕并出示手枪，以示必死之意。^⑪帝制派首脑梁士诒前往劝说，他指着大厅一柱直对梁说：“你们如再逼我，就撞死在这里”。^⑫梁知无劝说余地，只得垂头离去。袁封他为亲王后，两次派人致送册封令，两遭拒绝，三次送去亲王薪俸，三次却还。洪宪帝制期间，黎闭门谢客，惟以书法自娱。他冷笑语人：“项城作皇帝，我到书法成家，从此可点翰林矣。”^⑬黎反袁称帝，是有个人打算的。但在帝制与共和的尖锐斗争中，有些老革命党人如孙毓筠、胡瑛、李燮和都成了帝制策划者，孙武也上书接受册封，黎能站在共和一边，与那些逢迎帝制、屈膝称臣者比，总算略胜一筹。黎去世后，有人赠他挽联：

政体变共和，代中山克底于成，我公允传千古；

初衷能贯彻，遇项城不夺其志，历史问有几人！^⑭

虽然过于溢美，也不能说毫无根据。

1917年张勋复辟，黎有引狼入室之责。而在危急时刻，维护共和，反对复辟，态度明

朗，精神可佳。7月1日凌晨，张勋等人潜入清宫，拥废帝溥仪复辟，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，易五色旗为黄龙旗，一时风云突变，山河改色。当天张勋派梁鼎芬赴总统府劝黎附和复辟。遭到拒绝。张勋捏造他奏请归政，他即日通电全国，严正声明：“闻本日清室上谕，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，不胜骇异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，实五族人民之公意，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，自当始终民国，不知其他。特此奉闻，藉免误会”。为了挽救共和，他不但通电各省出师讨伐，电请冯国璋继任总统，而且不顾前嫌，下令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，促他早日出师。在全国一致声讨下，张勋复辟很快破产。
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军阀拥兵自雄，混战不休，陷国家于危亡，致生民于涂炭。如何对待军阀割据，是衡量政治态度又一重要标志。如前所述，黎元洪早就主张军民分治，后来受了段祺瑞摆弄，对军阀专权是有体会的。所以1922年直系军阀要他复任总统，他就提出要先行“废督裁兵”而后就职。这年6月6日，他通电指出：“自督军制兴，滥用权威，干涉政治，囊括赋税，变更官吏。有利于私者，弊政必留；有害于私者，善政必阻。”电文详细分析了军阀专权的祸害，要求各省督军立释兵权，刻日解职，“待元洪于都门之下，共筹国是”。^⑧该电因为颇合全国公意，得到社会广泛同情。第二天，孙中山也在广州发表大旨相同宣言，主张改兵为工，并要求控制北京政权的直军带头首倡。以后，黎又多次敦促各省废督裁兵。因为他的主张不符合军阀胃口，结果“言废督而督军日侈，言裁兵而兵额日增，言停战而战祸日滋，言止债而债务日起”。^⑨本人也因受到军阀排斥，于1923年6月第二次被逼下台。直到1928年临终遗嘱，还主张“实行垦殖政策，化兵为农工”。^⑩尽管都是纸上空文，其精神不无可取之处。

第三是经济上投资方向的改变。存在决定意识，意识反过来也影响存在。黎元洪由于政治态度改变，经济投资方向随着改变。清朝末年，经济收入除家用外，全部用来购买土地房屋，从事封建剥削；辛亥革命后，随着政治方向改变，逐渐转向投资实业，进行资本主义经营。他的投资情况，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：

前期：清朝末年。集中购买土地房屋。计自1902年至1910年，共购农村土地32次，用钱21,609串，其中买水田202石，每年收租谷约两千多石，同时还附带买了一些麦地、生熟旱地、草场房屋；另外在武昌城里买房屋基地2,244方，房4大间，用钱11,930串又银1,000两。这些城市土地因为处在中和门等偏僻地带，性质与农村土地无大差异。^⑪

中期：民国初年。购买土地房屋和投资实业同时进行。在这期间，他一面继续购买农村土地，同时在天津购买地皮和洋楼，而且大量投资实业。计自1912—1921年，共购买农村土地45次，用钱27,873串又950元，其中买水田313石，每年可收租谷三千多石。这时除用了一些钱在武昌城里买基地1,089方、房14大间外，在北京东厂胡同买房560间，基地五块；在天津英德两租界买洋楼1所，地皮16亩多，共用钱7,518串，银54,544两，洋55,450元。^⑫另外，从1915年起，投资中兴煤矿，1917年下野后，大量投资实业，其中主要的有中美实业公司、震义银行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、湖北石膏公司、久大精盐公司、中原煤矿公司、六河沟煤矿、怡立煤矿公司等等，共计实业投资至少二百多万元。

晚期：专门投资实业。1923年黎第二次当大总统下台后，他的政治主张经过实践都破了产，从此专心经营实业。在这期间，军阀混战连年，帝国主义侵略重新加强。他投资的企业无不由盈转亏。对此，他非常关心。为了扭转颓势，他在重病之后，还邀集投资企业主持人和技师到天津，专门研究改进之道。为了增强抵抗帝国主义在华煤矿实力，又倡办了中法大沽公司，

专运中兴煤炭到上海等地销售。

根据有关材料考查，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从来没有投资实业；进入民国以后，他的绝大部分私人财产皆转为实业投资。总计先后投资的银行厂矿 45 个，其中银行 17 个，煤矿 6 个，纺织厂 5 个，面粉食品厂 7 个，其他 10 个。^②除担任中兴煤矿、中美实业公司、震义银行的董事长外，还任黄陂商业银行总董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六个企业的董事。他的投资额无确切统计，估计不下 200 万元。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共买土地 77 次，如果将钱折银，总计用银不过 5 万元，不到企业投资的四十分之一。即使把购买城市土地房屋的钱加在一起也只 20 万元，仅及实业资本的十分之一。他实际上已逐步资产阶级化了。

从上述思想、政治、经济三方面考察，黎元洪经过辛亥革命，思想上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加；政治上由帝制派变成共和派；经济上慢慢向资本主义转化。这是他的主流，他的基本倾向。忽视这个主流，仍然认为是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，是不合适的。

二

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，武昌起义前的黎元洪，纯粹是一个为清朝统治忠实效劳的军官。他居鄂十多年不曾对革命表示过同情，更不曾与革命党人交往。当革命党人打入军队进行活动时，他曾多次把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开除、撤差。象这样一个人，最后终于由君主派变成共和派，成为一个拥有资本 200 万元以上的资本家，这些说明什么呢？是什么力量促成他的转变呢？！

黎元洪的转变，首先是他本身具备一定的转变条件。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和封建顽固派同属于封建营垒，但和顽固派是有区别的。一是受的教育影响不同。黎少时虽受过封建教育，却不是科甲出身。他从 20 岁入北洋水师学堂，“学习英国语言文字、地舆、算学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重学、水学、格物、化学、绘图、测量、操演枪炮鱼雷机器等技。”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世界知识。以后三次赴日本学习，前后历时 15 个月，^③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有较清楚的了解，耳濡目染，使他受到深刻影响；二是他曾亲自参与经营管理过许多湖北官办的军民工业。在督办经理这些企业中，他一方面看到先进生产技术的优越性，同时觉察到封建式的经营管理方式的腐朽，和日本新式企业管理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不能不激起改革的愿望；三是他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。当黎在日本考察时，曾游览日本东京大阪等处，看到公园里大量陈列甲午战役中在我国及朝鲜夺得的战利品，认为是奇耻大辱，曾与侨胞集议，请求清廷驻日监督和日方商洽撤去；1909 年，湖北留学生张伯烈等回国发起川粤汉铁路民办运动，反对举借外债。黎元洪以军界代表参加了各界联合成立的铁路协会，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热情，成为后来他被举为大都督的“前导”；^④四是黎在军中注意以身作则，廉洁奉公，体恤士兵。“不滥费军需一钱，有余，即以逮士卒，故所部军装整振，绝于他军。”^⑤从而在军界中赢得较高威信。此外，他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有较多的交往，在军队中注意吸收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。由于有这些区别，在处理某些问题上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。比如 1906 年，黎奉派去镇压萍浏醴起义。未到萍乡，就召集所部演说，主张区别对待。他说：“吾侪此行当先辨暴徒之性质，果为党人而含有政治上之臭味，诚不必与之战，宜设法解散之；若土匪，尔曹盍努力锄之，以绝根株”。^⑥又如武昌起义前夕，革命党机关被破获。党人名册被搜去，瑞澂主张按名严办，黎则主张别图处理，以致瑞澂怀疑“元洪有贰，严词申斥。”^⑦凡此种种不同，无疑是黎元洪后来转变的基础。

革命党人的胁迫，对促使黎元洪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。黎元洪投身革命洪流，开初完全是被动的。10月11日清晨，马荣等在谢国超家找到他，请他出来主持大计。他不肯就道。革命党人以生死相迫，才连说“我去！我去！”后来被举为都督，要他在安民告示上签字，他颤抖地说：“莫害我！莫害我！”李翊东气愤不过，把枪口对着他说：“我们不杀你，要你作都督，你还不愿意！再不答应，我就枪毙你！”^②蔡济民陈磊等急忙劝止，黎才默不作声。两星期后，黎在致萨镇冰的信里说：“洪当武昌变起之时，……换别衣避匿室后，当被索执，责以大义。其时枪炮环列，万一不从，立即身首异处。洪只得权为应允。”^③这里讲的，自属实情。

黎元洪的转变，革命党人的争取帮助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强迫方法可以捆住黎的身，却不能安定他的心。黎真正思想上有所转变，靠的不是强迫，而是革命党人的真诚争取。黎过去对革命概不与闻，要他出来主持大事，他不敢懵然答应是可理解的。他被马荣等找到后，徐寿林“即将民军情形详述颠末，并拥黎公至楚望台细察一切”，^④还给他备马乘坐。黎见举动文明，态度开始改变。黎不知革命底里，最担心的是革命力量太小，不足以抗强敌。所以到了楚望台就询问“革命党所持奥援者何处？钱粮多少？”邓玉麟、熊秉坤相继作了说明。^⑤后来到了谘议局，他两日不食，也不与人谈话。革命党人又公推数人专为他“细述党人起义之宗旨并各省联络之势力”，^⑥反复进行开导。他们不但善言苦劝，而且用实际行动激发。当黎不愿担任都督时，测绘学堂学生朱树烈“举刀自杀，血溅满座以感之”。^⑦蔡济民也拔出手枪，厉声说道，事已至此，黎公再不允就，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，而慰死难诸先烈。^⑧真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经过连日劝慰，他才慢慢心有所动。

黎元洪的转变，起决定作用的是革命的胜利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鼓舞。他在武昌起义之初，由于不相信革命能取得胜利，经过革命党人的真诚劝导，心虽有所动，却一直未下决心。可是，革命形势的发展，终于使他下了这个决心。继武昌起义之后，胜利的凯歌频频传来，他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，才公开表示赞成革命。10月13日下午，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，黎当众表示：“我前天未决心，昨天也未决心，今天上半天还未决心，这时是已决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，成败利钝，死生以之。”^⑨大家看到黎表了决心，立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

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，对黎元洪的转变是一个莫大的鼓舞。武昌起义后，广大群众怀着对清朝统治的切齿痛恨，热情主动投入革命的洪流。武昌的人力车工人。得知革命起义，自觉奔赴楚望台，冒着枪林弹雨，为革命军输送弹药；汉阳兵工厂工人，不分昼夜赶制军火，支援前线；革命军树旗招兵，工人农民纷纷投奔，四五天内就招募了三万多人，来投者仍然源源不绝。汉口刘家庙战役，是保卫武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战。10月18日，当铁厂工人拆去路轨致使敌车翻倒时，附近农民及埋伏在稻田里的铁路工人，一呼百应，如闪电般蜂拥而上，奋起杀敌，一举歼敌千余人。汉口市民闻刘家庙大胜，欢呼的鞭炮声连日不绝。^⑩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，使黎元洪看到了人心的向背，知道清政府大势已去，无可挽回。他在亲笔致萨镇冰的信中称：“吾师素知洪谨慎，何敢仓猝出此！虽视事数日，未敢轻动。盖不知究竟同志若何？团体若何？事机若何？……今已视师八日，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。昔武王云：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；予有臣三千，惟一心。今则一心之人何止三万！……即就昨日陆战而论，兵丁各自为战，虽无指挥，亦各奋力突进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，持刀协击，毁损铁轨者指不胜屈，甚有妇孺匍面包茶水入阵者。此情此景，言之令人奋武！谁无肝胆，谁无热忱！……洪有鉴于此，识事机之大有可为，乃誓师宣言，矢志恢复汉土，改革专制政体，建

立中华共和国，维持世界和平。”^⑤

武昌起义的炮声，在全国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。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各省革命党和人民群众闻风响应。从10月10日到11月9日，仅仅一个月，就有湖北、湖南、陕西等十三省和上海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，脱离清政府独立。清朝统治土崩瓦解。黎看到这种全国胜利形势，更受鼓舞，在三致萨镇冰的信中说：“鄂军起义，实愤专制之流毒，故以民主相号召，未及匝月，响应在十省以上。虽三尺童子，皆切齿于清政府，欢迎民军。”他从现势中看清了“专制政体之必亡”，^⑥更加坚定了对民主共和的信心。

先是政治思想的转变，再有经济态度的转变，是黎元洪辛亥革命后转变的一个特点。他的投资方向的转变，除了政治因素之外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显示出的优越性对他有很大吸引力。辛亥革命后，封建束缚有所放松，世界大战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减轻对中国的压迫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乘机获得重大发展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，给资本家带来异常丰厚的利润。即以黎的亲身经历来说，1912年，经他批准，他的把兄弟徐荣廷等组成楚兴公司，承租湖北纱布丝麻四局，投资仅70万两，1914—1919年六年间即获利580万两，^⑦等于资本的8倍多；黎本人投资的中兴煤矿，也是年年获得厚利。据黎重光回忆，最高的一年，股东们分得股息达四分八厘，差不多是借贷利息的10倍。高额的利润使黎欣喜若狂，认为“这条路走对了”，于是只要有人前来招股，他就认购。甚至手头紧，也向银行借款投资。^⑧高额利润成为他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强大动力。

三

黎元洪的阶级转变是历史的产物，时代的产物。时至二十世纪，资本主义在世界早已取得统治地位；而在中国，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，资本主义则在刚刚兴起和发展。它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比较，远远落在先进国家的后面，而且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中国要富强，中华民族要生存，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迅速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，建设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，尽快跟上历史的进程。因此，当时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，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，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是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，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。黎元洪的转变，正是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，走历史必由之路。

黎元洪的转变，是没落地主阶级进一步分化的反映。经过辛亥革命，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分化瓦解。不少顽固分子虽然仍旧死死抱着封建僵尸不放，而哪些比较开明的地主士绅已开始觉察到死守现道是没有出路的，需要顺应时代潮流，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。列宁曾经指出：“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”。^⑨在当时的中国，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相比，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黎元洪由帝制党变成共和派，由投资土地转向投资实业，当然也是一个巨大进步，是弃暗投明，由反动走向进步的表现。是一种值得欢迎的转变。

从当时阶级阵势来分析，黎元洪既不是革命派，也不是极端反革命派，而是中间力量的代表。阶级斗争是两种阶级力量之间的生死角斗。要赢得胜利，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，才能扩充自己势力，削弱对方，击败敌人。自从武昌起义以后，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革命，就曾采取各种措施来争取可以争取的一切力量。袁世凯上台后，还派遣“心腹多名，分道驰往各省，发布传单，演说谕众”。^⑩他们对于黎元洪，也在拚命设法争取。如柯逢时等密电军机处，建议升黎元洪为统制以示笼络；^⑪梁鼎芬拍电报给黎，声称“倘能率队来归，芬愿以

全家担保，向朝廷为公洗刷也。”^②袁世凯对黎尤为重视，既派刘承恩以同乡身份诱黎，又致书反复开导，声言只要改变态度，“不独不究既往，保证定必重用。”^③由此可知，黎是双方都高度注意争取的对象。

为什么双方都十分重视争取黎元洪(从武昌起义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都是如此)?!正是因为黎不只是黎一个人，而是代表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。因此，在双方争夺中间力量的斗争中，革命党人争得黎元洪的转变，是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。有人曾经提出：“革命中最大的错误之一，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”。其实，黎元洪出任都督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问题不在于不该举黎当都督，而在于把他争取过来以后，没有能使他沿着革命轨迹继续前进，致使一度陷入袁世凯的圈套。将此说成“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”，是不大恰当的。

非革命的黎元洪担任革命军都督，确实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。他在湖北都督任内，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。但在当时，观客上也起过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。

回顾武昌起义之初，参加首义的士兵不过三千人，其中大多数且是没有加入革命党的士兵。有些附从革命的士兵担心举事不成，祸及身家，纷纷潜逃走避，军心不稳的状况可想而知。至于城内广大市民，对革命很少预闻，耳听隆隆炮声，茫茫不知所措。黎元洪出任都督，对这些人无异服了一付定心剂。据许多首义老人谈，都说当时“非黎协统出来不行。”^④黎任都督的消息传到军中，“士兵有鼓掌欢呼的，”并说：“黎统领也出来了。”^⑤至于市民，一听到城内外贴出都督黎的布告，“往观者途为之塞，欢声雷动，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，拥至布告前，必欲亲睹为快，人心为之大定”。^⑥这是一；其次，对于旧军官及绅商、学界与各省响应也有一定影响。黎元洪素得军心，资望较高，而且在南京、北洋、湖南、安徽、河南等军，无不有他的旧部。^⑦他推为都督，很自然在军、学、绅、商各界会引起连锁反应。如立宪派李国鏞得知黎出任都督，就“急欲出助。”^⑧起义时许多军官逃散避匿，“自黎出之风一播，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”。^⑨“所有逃散之陆军官长，闻黎公出任都督，多归附焉”！^⑩至于各省纷起响应，当然主要是革命党人长期活动的结果，但也无可否认，由于黎出任都督，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1912年，胡汉民随孙中山到达武汉时就说：“非黎公出而号召，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。”^⑪解放后，一位首义老人也说：“平心而论，各省闻风响应，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起了一点推动作用”；^⑫第三，黎元洪出任都督，对清朝统治和顽固势力是个重大打击。黎为清朝效力二十多年，对清朝官场十分清楚。现在他变成革命都督，又跟着一大批官兵转向革命，各省纷起响应，清朝统治中的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，人心无可挽回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据说瑞澂当起义时，以为是“小寇蜂起”，不难平定，蹲在江心楚豫兵舰里准备卷土重来，及得知黎出任都督，“乃去”^⑬。而潜伏于武昌城内的“残敌更心惊胆裂，易装潜逃者甚多”。^⑭

本文重点探讨了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，对他在革命后的缺点错误则没有多加分析，目的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对过去被人忽略的一面加以阐述，以利于对他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。其实，他在辛亥革命后，在逐渐有所转变的同时，也犯过不少严重的错误和罪行，因为不是本文重点，就不详述了。

“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！”黎元洪功罪如何？在全国大治的今天，我们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，还他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① 《黎元洪复袁世凯书》，张国焘：《辛亥革命史料》，第281—282页。

②④⑥⑦⑭⑮⑯ 易国干编：《黎副总统政书》，卷二，第7页；卷三十三，第1—2页；卷二十，第1页；

卷九，第11—14页，卷一，第3、4页。

- ③ 《胡汉民自传》，《革命文献》，第三辑，第439页。
- ⑤ 陶菊隐：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第三册，第157页。
- ⑧ 《黄兴复黎元洪电》，《黎元洪来往函电存稿》。
- ⑨⑩⑮ 薛民见：《黎元洪年谱资料》，1961年油印本，第44、23页。
- ⑪ 黎劭平：《宋卿先生与北洋军阀》，《辛亥首义史迹》第27页。
- ⑫ 黎绍芬：《黎元洪事略》，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一辑，第134页。
- ⑬ 刘成禺：《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》，京华印书馆版，卷二，第20页。
- ⑭ 《贾仲明挽黎元洪联》。
- ⑮ 《黎元洪主张先行度督裁兵然后就职电》，刘楚湘：《癸亥政变纪略》第12页。
- ⑯ 《黎元洪复洛阳吴巡阅使电》（1922年11月25日）。
- ⑰ 《黎元洪临终遗嘱》，藏天津市政协文史组。
- ⑱⑲ 据保存完整的黎家田地房契副本统计。
- ⑳ 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。
- ㉑ 《三品顶带尽先补用都司黎元洪履历清单》，《故宫档案》，兵部武选0020(7)号。
- ㉒④⑬⑭ 《辛亥革命资料》，第494，566，563，499页，中华书局1961年版。
- ㉓⑤⑥ 章太炎：《大总统黎公碑》，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下，第844页。
- ㉔ 贡少芹：《黎黄陂轶事》，第8页，国华书局民国五年版。
- ㉕②④⑤⑥⑦ 《辛亥首义回忆录》第一辑，第10，45，149，134，45，61页。
- ㉖ 《徐寿林事略》，《湖北革命实录馆资料》Ⅱ，第107号，藏湖北省博物馆。
- ㉗ 《湘汉百事》，新中国图书局民国元年编印。
- ㉘⑫ 张难先：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，第266、274页。
- ㉙ 《辛亥首义回忆录》第二辑，第79页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版。
- ㉚ 《甘绩熙自述》，民国二年版。
- ㉛ 剑农：《武汉革命始末记》，《民国报》黄帝纪元4609年10月1日第1号。
- ㉜ 胡焕宗：《楚产一隅录》，第20页，乾记印书馆1920年版。
- ㉝ 黎重光（元洪长子）给肖致治信（1981年1月17日）。
- ㉞ 《列宁选集》第4卷，第55页。
- ㉟ 《辛亥首义回忆录》第四辑，第39页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。
- ㊱④ 杨玉如：《辛亥革命先著记》第75页。
- ㊲ 《武昌都督黎元洪之历史》，《湖北革命实录长编》第一册。
- ㊳ 《武汉战纪》（黎元洪主持编辑），《辛亥革命丛刊》，第三辑。
- ㊴ 居正日记，转见沈云龙：《黎元洪评传》第31页。

（上接第96页）

狄更斯是十九世纪美国伟大的资产阶级作家，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是一部有杰出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品。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，英国工人运动的不积极状况，以及英国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，这些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，使得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尖锐矛盾的现象：一方面是一个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，一方面是一个沾沾自喜的庸俗的资产者。这两方面的结合，就形成了本书思想倾向上的基本矛盾：一方面他勇

敢地挑开维多利亚女王盛世的纱幕，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所谓盛世里，到处都充满黑暗、腐朽、荒淫和残暴。但另一方面，却又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永世长存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仍可能实现善恶有报。善良的人虽经许多磨难，最终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爱戴。

当然，这一切在本书中是第二位的东西，只要我们善于学习，完全不妨碍我们对这部伟大作品的阅读与欣赏、并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。